



物华

WUHUA

史影

SHIYING

——陇原文物赏萃

祝中熹 著

甘肃省博物馆 编

三秦出版社

SANQINCHUBANSHE



物华

WUHUA

SHIYING 史影

——陇原文物赏萃

祝中熹 著



甘肃省博物馆 编

三秦出版社

SANQIN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物华史影：陇原文物赏萃/祝中熹著；甘肃省博物馆编.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
ISBN 7—80736—052—6

I. 物... II. ①祝... ②甘... III. 文物—汇编—甘肃省 IV. K872.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0911 号

物华史影——陇原文物赏萃

祝中熹 著 甘肃省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75

插 页 3

字 数 280 千字 图 224 幅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736—052—6/K·36

定 价 38.00 元

汲古得便驅毫如飛
天欲望人三騎絕塵

丙戌孟夏書

中素老友昔日筆由賀其新著付梓

平原曹晟功





序

刘光华

新中国考古事业迅猛发展，甘肃也不例外，境内出土的文物因此十分丰富，使甘肃成为全国文物大省之一。丰富的古代文物，是我们祖先的创造，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甘肃人，理应认识她，认识她的价值，让她成为激励我们创造新生活的动力。文物本身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当她的真实面貌和生动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却未必能认识到她的价值。为什么？因为要认识她的价值，这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我们一般人不具备。就是学考古学出身的人，如果其阅历不丰富，知识水平不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底蕴不深厚，



恐怕最多只能辨别其真伪，也难以认识到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隐藏在她背后的故事。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兴致勃勃地到博物馆、石窟寺去参观，由于这方面的欠缺，总感到很累很累的原因。

现在好了。对我们甘肃的精品文物，有一本叫《物华史影》的书，就是专门作普及性介绍的，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我感到这本书有下面几个优点：

第一，文笔流畅，通俗易懂。作者对本书的写作很重视，特别提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掘一件文物的文化内涵，展现其风采和魅力，这就要求改变已往介绍文物的呆板程式，营造较为高雅的鉴赏品味，树立一种丰实清新的文风。”具体地说，就是要有可读性，“行文要活泼流畅，饱满有致，表述清晰，不要使读者触目数行即生倦意”。由于此书中的许多篇章原来发表在报刊上，图文并茂，篇幅不长，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展示甘肃古代文化的辉煌，文字必须通俗易懂。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读者只要翻开本书，便会有亲身的感受。

第二，形象地反映着古代甘肃的社会历史情况。介绍的文物，或是国宝级的，或是国家一级的，从目录看，虽然分了类，但似乎很凌乱。如果细看内容，却涉及到了甘肃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纵的方面说，从原始时代起，历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从横的方面说，有各朝代关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文物。从使用者的社会地位说，有上至王公贵族的用品（如墓葬、礼器和饰品等），下至一般社会成员的日常用品。它们都是精品文物，作为其所处时代人文背景的实物载体，反



映着甘肃的古代社会。

第三,对文物本身的介绍详尽。一件文物一个题目,对器物的名称、质地、时代、规格、形制、文饰以及来源等,交代准确;对文物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如该类器物的起源和演变,社会功用和意义,产生的背景和时代特征,出土状况和传世经历,制造技术和工艺成就等等,依据器物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作了重点叙述。由于附有图片,读者可以仔细观摩,再结合文字的阅读,对该文物的了解就会深刻得多。

第四、揭示文物深层次的内容。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一些文物除一般性的介绍外,还介绍了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和评价,包括存在的争论、作者自己对争论的看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般人无法作到。

例如,国宝类第一目的“绿玉琮”,出土于静宁县治平乡,其时代为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兴起的齐家文化时期,距今4000~36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金、石并用时期,社会发展阶段处在原始时代末期文明出现的前夜。在商、周社会里,琮与璧、圭、璋、琥、璜一起,不仅是贵族阶级祭祀天、地、四方的礼器(“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也是他们死后敛尸的随葬品(“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或者放置于腹部,或者放置于棺下腰坑中。然而关于它的渊源,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如先民的手饰(如石镯一类)、纺织捻线的纺轮、观测天象的窥管、原始居室中的烟筒、象征女阴或放置男根之函的生殖崇拜、图



腾柱等等。作者同意这些说法中的图腾柱说,第一,举考古文物为例,浙江良渚文化中就发现有玉琮,琮上的神徽就是部族图腾的标志。在宗教仪式中,琮是套在木柱上使用的。玉琮同木柱的结合,正是图腾柱在宗教活动中仪式化形式;第二,从文字学上讲,琮字从宗,琮、宗形声一致而义通。宗字的初形,为堂室中央陈置祭台之象。《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示即祭台。卜辞中的“宗”字,正表祖庙之义。周代宗法体系中所谓“大宗”、“小宗”、“宗子”、“宗室”等语词中,宗字指家族血缘嫡长继承的主干体系,其含义即由祖庙之本义引申而出。三代礼制是以祖配天,祭祀祖神同祭祀天地常融而为一,这正和史前社会群体崇奉图腾的习俗一脉相承。这样,经作者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之后,我们对琮的渊源便十分清楚了。

再如作者对已被定为秦公陵园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的介绍,其中发现有两座大墓,即一座目字形大墓(即M3)和一座中字形大墓(即M2),并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了目字形大墓出土的一批鼎、簋部件和残片,在这些部件和残片中已修复了3个鼎,各有铭文6字:“秦公作铸用鼎”,另有5个簋也在修复中。另外,就是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有“秦公”铭文的4个鼎和2个簋,可能出自中字形大墓(即M2)。这两座陵墓的墓主是谁?特别引起史学家的关注。曾主持发掘、清理工作的戴春阳提出,大堡子山的大墓是夫妻异穴合葬墓,M2为秦襄公墓,M3为其夫人的祔葬墓。但本书的作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大堡子山的两个大墓



埋葬着两个秦公，即M3为秦襄公墓，M2为秦文公墓。理由为：1.依据文献，有资格以“公”的身份入葬的秦君，除秦襄公、秦文公葬于旧都西垂外，其余秦公的陵墓都在关中，所以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只能是秦襄公和秦文公；2.M3出土的秦器时代偏早，制作工艺粗陋，纹饰草率简约，铭文为镌刻而成，字体略嫌草率，笔画细浅，而M2出土的秦器，制作精致、华贵，其腹部的文饰较为繁复，足底也更粗大些，时代较晚，所以M2的时代比M3晚；3.M3全长113米，规格较大，在北，北为上、为尊，地势也居高处；M2全长88米，规格较小，在南，南为下为卑，地势也较M3为低。如果M2为秦襄公墓，这种襄公墓反而小于夫人墓，并且位居夫人墓之下的葬制，有悖常理；4.有学者指出，大约每隔50年，青铜器在形制、文饰、铭文及制作工艺诸方面就能看出较明显的变化，秦襄公（前770—前765）和秦文公的去世（前715），相距恰好50年。所以，大堡子山秦器从襄公时的工艺粗陋，纹饰草率简约，发展到文公时的制作精致、华贵，文饰较为繁复，乃是很正常的事。作者在这里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地列举论据，对大墓的主人提出了新看法。

《物华史影》的优点还可以列出一些。但通过上述有限的介绍，已足能说明这是一本好书。它不仅好在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作者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我们勤劳祖先所创造的优秀物质文化，并揭示其深层次的蕴含。

本书的作者祝中熹先生，我们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甘肃省史学会年会上认识的。后来他去了庆阳师范专科学校（今陇东学院）



历史系任教,再后来他又调到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工作。他很早就开始钻研先秦典籍,研究先秦史,后来又转入古代史的教学工作,有深厚的历史研究功力;又在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从事文物研究与宣传十余年,对省馆珍藏的重要文物十分熟悉,并且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坚实的文史素养同大量文物精品相结合,形成了他特有的优势,由他来写这类普及型的读物,引人入胜是必然的。希望读者与我一样,喜欢这本书。作者写的是甘肃出土的文物,但作者所抱以文物证史、述史的宗旨,以及所发掘的文物内涵,却不受省域的限制,立足于光大华夏文明的角度而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卷首语

1996年岁末，时任甘肃日报社专刊部主任的许维先生和编报室主任魏义先生，同来甘肃省博物馆约稿。他们计划在“社会周刊”内辟创“甘肃文物精华”栏目，专文配图，赏析陇原优秀文物，展示甘肃古代文化的辉煌。为此，要求省博给予支持和配合。当时的馆党委书记是周云凝先生，他约了主管业务的副馆长张朋川研究员和时任历史考古部主任的我，共同会见了许、魏二位。我们认为，报社此举和文博事业精神完全一致，能在媒体上为博物馆提供一片向大众宣传文物的园地，实乃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双方约定，该栏目每周一期，每期赏介一件文物，文图相配，千字左右。先从国宝级文物写起，然后接着写国家一级文物。馆领导当即把供稿任务交给了历史考古部。

过去报刊上也偶有介绍文物的内容出现，但大都是“豆腐干式”的版面，一般只说明文物名称、时代、出土地，再加几句虚泛的赞语。文字很易流于枯燥乏味，因而读者往往不感兴趣。接受了上述任务后，我就想，既然省报为此开辟专栏，即应在版面规定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掘一件文物的文化内涵，展现其风采和魅力。这就要求改变以往介绍文物的呆板程式，营造较为高雅的鉴赏品位，树立一种丰实清新的文风。于是便在心中自定了撰文的四条原则：资料性，知识性，学术性，可读性。资料性是指对所选介文物建档的物质性依据，如名称、质地、时代、规格、形制、纹饰以及来源



等,要做准确交待。这是人们了解、赏鉴该物的前提和基础。知识性是指阐述文物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时必然要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如该类器物的起源和演变,其社会功用和意义,其产生背景和时代特征,其出土状况或传世经历,其制造技术和工艺成就等等,应当有选择地向读者重点申说。这是人们了解、赏鉴该物的窗口和门径。学术性是指对某件选介文物的研究和评价,学界已有的成说和最新的见解,存在的争论乃至笔者个人的看法等等,要做简明指点。这是深化读者感知、激发读者探索志趣的磁石和路灯。至于可读性,是指行文要求活泼流畅,饱满有致,表述清晰,不要使读者触目数行即生倦意。

本着这四条原则着手组稿,开始比较顺利。从1997年元月份起,一批赏鉴国宝的文章陆续见报,社会各界反映也还不错。然而时间一长,供稿便有些吃力,渐陷窘境。这一则因为部内工作阶段性强,突击任务多,业务一忙同事们便无暇他顾;二则因为这类短文表面看来是小菜一碟,但要按上文所言四条原则来写,实在也不容易。报酬微不足道,又不算“学术成果”,谁愿意老接受这种“差事”?所以,维持了一阵子之后,便只得由我独自承担了。好在后来这个栏目扩大为向全省征稿,不再需要甘博每周供文,我每月写一两篇,倒也不是太大的负担。由于颇受读者青睐,《甘肃日报》版面内容虽几经革新,这“文物精华”栏目却始终保留着,跨新旧两个世纪而玉立至今,版幅也由每文千字扩大到一千五百字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该报原“社会周刊”责任编辑彭中杰先生和后来“文化时空”责任编辑吕宝林先生、牛庆国先生,他们都为“文物精华”倾注了不少心血。

就个人情况而言,我本涉足于另外的学术领域;但我一直严肃



认真地对待宣传文物这项工作，从不低估它的社会意义。在我看来，这是在华夏古文明与人民大众之间构筑精神桥梁的文化工程。能为这项工程砌几块砖，是一个文博工作者应尽的义务。时间一晃便是八年多，期间我坚持一篇篇地写，有时写得轻松畅快，有时写得苦涩艰辛。之所以有后一种情况，是因为决定选介的文物，有一些所涉及的知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得从头学起。这里有个文物选择标准问题。文物的价值档次并非关键，因为栏目本身有限定：只介绍国宝级和国家一级文物。它们都是可以粲然陈于古代文明殿堂之上的精品。但既然是“选赏”，便存在权衡取舍，而且不能以撰稿者的个人兴趣为定夺。值得考虑的因素甚多，比如器物门类、时代的代表性，形制、工艺的典型性，样式、风韵的观赏性等等。我选写文物则更多地着眼于器物所包含的信息量，即它同当时社会生活关联的密切程度，它能否在较深层次上从某一侧面反映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精神是靠物质负载的，每一件文物都是社会产品，都是特定人文背景下群体生活的物质遗存；它不仅凝聚着制造者的劳动和智慧，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风貌和特征。发现、识别、阐述、验证、评价文物所包含的信息，是我们了解、追思古代社会唯一的物质途径。说到底，人类的文字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物质遗存的识别史，文物的社会价值即在于此。可是，虽然每件文物都蕴藏着“无限大”的信息量，但各种信息对我们来说其意义却是不同的。任何时代的社会都由若干层面组成，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如此。一件文物的社会地位不同，它所反映的社会层面不同，它所负载的文化因素不同，我们从它身上发现信息的意义也便不同。从这个角度说，选择那些所含人文意义层面的信息量较多、能较深地揭示时代与社会本质因



素的文物赏析,就可以给读者提供较丰富的知识。不言而喻,写这类文物的难度相应地也较大,须翻阅、查证许多资料;一篇千余字的小文,有时竟至耗数日之功,甚至会因不胜烦恼而搁笔。另一方面,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也常受到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的鼓励。他们以各种方式向我表示对这类文章的赏识,不少人还作了剪贴收藏,有的朋友希望能结集出版,这都很令我感动。最近整理自己的发稿目录,发现此类文物赏析短文竟已累积了120多篇,另外还有些刊登在杂志上的同类或与文物相关的文章,合起来计有136篇。配上图片,正是一本文化普及类小书的分量。自忖如果结集,对于当今大众文化情趣日益兴浓的时代来说,不至于毫无裨益;对我个人来说,也算是八年多来主体学术研究之外的“副产品”汇聚纪念。于是请老伴帮忙,收集样报样刊,剪贴复印,分类编目,取名曰《物华史影》。负责图片拍摄的是甘肃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赵广田先生,我们是同事同乡兼邻居,多年来在业务上一直协作配合得很好,结集之意向他说明后,他立即欣然允诺。此书的雏形就这样孕成了。

有两点须向读者略作交待。其一,书中“国宝类”文章,大部分不是《甘肃日报》“文物精华”栏目发表的原文;它们有的经过改写,有的刊载于某些杂志。这是因为,《甘肃日报》该专栏初设时,如前文所述是从介绍国宝级文物开始的,文章篇幅控制在千字左右;而后来介绍重要性次于国宝的一级文物时,篇幅却渐放宽至一千五百字左右。如今回过头来通阅诸文,这种现象便显得有悖常理:绝世珍品反倒文促意简,难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相称。有鉴于此,便毅然决定把最初撰写的那批国宝级文物短文撤下,换上一批阐述较为充分的文章,篇幅多在2000字~3000字之间,行文风格也和书



中其他类文章略有区别,细心的读者不难品味出来。其二,部分文章中的某些表述,偶有重复。这是因为当初选材撰稿时,只专注于文物“个案”,一文一物,独立成篇,不曾有将来要分类编目成书的整体规划,所写文物的类别、时代和质地是杂乱无序的,不成系统。两件或数件同时同类或出土于同地的器物,撰文时间可能相距数年,虽然各文论说的重点不同,主题不同,但说明文物来历、介绍时代背景时,难免有语意重叠现象。如今结集须按类别和时代梳理,上述毛病便突现出来;为了保持文章结构的完整性,又不宜将某些话语强行剔除。此外,少数文章的标题,因统一全书规格,避免雷同,个别的是为了修辞的需要,也作了适当的变动调整,与发表时的原貌并不完全一致。这些都是笔者深怀歉疚而恳请读者见谅之处。可聊以自慰的也有两点:一是趁此结集之机,对文章中的一些错误作出纠正。它们有的缘于笔者的无知和疏忽,有的出自排印时失察。某些问题不属失误,但情况有变化,我以“附记”形式在文后作了说明。二是许多参考性图片,初发文时因受版幅限制不能附上,这次成书则可适当插入一些,全书选收文章136篇,赏鉴文物148件,连同参考性图片,共含插图224幅。这样分布文、图比例,庶几会对读者有所裨益。

关于本书第七部分,还想再多说几句。这几篇文章是在成集后又决定补充编入的。《陇原青铜器概说》,是为甘肃省文物局编印的《甘肃文物精华》青铜器部分所写的简论,当时因篇幅限制严格,对内容作了些删削,现将原稿收录于此。铜奔马是甘肃省影响最大的一件国宝,作为我国的旅游标志,其形象已炫目流辉于全球,编入两篇考辨性文章,是想为关心此马的读者,提供些深入感知、不为误说所导的思考依据。赏析大堡子山和圆顶山出土器物的两文,是



应《收藏》杂志的特约而撰写的。鉴于礼县秦西垂陵区的发现是上个世纪后期甘肃省文化领域最具轰动性的事件，受到全国乃至海外考古学界及古史学界的密切关注，觉得有必要对陵区背景与重点文物作些系统介绍。虽然文中列举的器物有几件已为《甘肃日报》写过专文，但综合性析述有助于读者对陵区的全面了解和总体把握，故未避重复之嫌将两文收录集中。这也许与笔者曾在礼县工作多年，视礼县为第二故乡，对礼县的史事和文物情有独钟有关。笔者的这种情怀，在为礼县老年书画协会及礼县博物馆合编的《礼县金石集锦》所写的跋中，有更直白的表露。

最后，我要向甘肃省博物馆的领导、历史考古部的同事，以及社会上关心我、支持我写作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热情鼓励和帮助，我很难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坚持做这项表面看来不起眼，实际上应合时代需要的工作。尤其是俄军馆长，对我的学术活动一直给予多方面的关怀；正由于他基于繁荣甘肃文博事业的公心而鼎力玉成，此书最终才得以结集面世。

祝中熹

2006年2月8日



目 录

序	(1)
卷首语	(1)

一、国宝类

1.高柱弧棱绿玉琮	(3)
2.文苑重宝《仪礼》简	(9)
3.医药古简炳千秋	(13)
4.情趣盎然六博俑	(17)
5.汉笔珍品“白马作”	(21)
6.傲世凌空铜奔马	(25)
7.精雕佳构造像塔	(30)
8.宝器五重容舍利	(33)
9.雪原骄子牦牛健	(39)
10.三珠虎符银镶字	(43)
11.出水芙蓉莲花盏	(49)
12.肃府刻石存墨宝	(52)

二、青铜类

1.齐家文化环首刀	(61)
2.权杖巧饰四羊首	(64)
3.人面柄首青铜匕	(68)
4.商代“亚”徽青铜鬲	(71)